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 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联文学回顾

王兆阳

(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部,陕西西安 710064)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前苏联文坛,出现了30多年间从未有过的活跃局面,许多在20-30年代遭到冷遇、镇压或者40-50年代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家相继恢复名誉,大量长期被束之高阁的遗著、旧作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苏联文学界,这一鼓动成为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的“前奏曲”。

**关键词:** 80年代后期;前苏联文学;急遽演变

**中图分类号:** I3/7.064 **文献标识码:** A

### Rain Comes from Wind

#### —— Review of Former Soviet's Literature of the end of the 1980's

WAN G Zhao-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there has been an active situ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s literature field, which had never existed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So many writers who had been ignored and put down in the 1920's and who had been criticized inaccurately in the 1940's and 1950's had regained their reputations. A lot of old writings ever been forbidden or neglected had made a notable impact on contemporary Soviet's literature field, and the movement had been a prelude of the disorganization of former Soviet in the 1990's.

**Key words** end of the 1980's; Soviet's literature; rapid evolvement

#### 文学是社会的晴雨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令人震惊!冷静地回顾80年代后期苏联文学急剧变化的现状,我们一定会意识到:作为苏联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苏联文学已经向世人昭示: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必然到来。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思维》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家目前还未提出任何完整的東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停留在习惯的概念上,与生活的辩证法不相协调。哲学和社会学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历史学也面临着根本改革的任務,因此需要以一種创造性的思维对积累起来的理論问题和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分析”。“需要使社会政治

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这一切最早在一部分不满于现状,最少保守观念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响。特别是作家的思想,他们一方面积极要求为那些历史上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家恢复名誉,发表其作品;另一方面大胆揭露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消极现象。而且舆论工具本身也逐渐受到影响。随着书刊检查制度的取缔,文学界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活跃局面。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后,古米廖夫的作品开始发表,帕斯捷尔纳克遗产整理委员会也宣布成立。1986年底,《旗》杂志推出了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任命》,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接连发表了创作于20世纪20-70年代的大量文学作品。一时间,杂志的大多数版面上,旧作、遗著纷呈,凡是曾被禁止发表的作品都成了编辑部的

抢手货,广大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发表作出了热烈的反映

—

舆论工具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贯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这对经济、政治领域的固有状况造成了很大触动,由此又为冲破文艺界的局面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许多在二三十年代遭到冷遇、镇压或者四五十年代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家如古米廖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等被接连恢复了名誉;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在湮没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得见天日,其中包括《我们》、《初生海》、《基坑》、《狗心》、《亚当夏娃》、《安魂曲》、《不灭的月亮》等等;与此同时,一些侨民作家的作品也从不见容于正统文学的异端变成了民族的精神财富,被介绍给苏联读者: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保卫卢仁》和一些诗歌先后发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六卷集接连出版,十月革命时流亡西方并在卫国战争期间仍坚持反苏立场的女诗人吉比乌斯的诗作也出现在杂志上……大量长期被束之高阁的遗著、旧作猛烈地冲击了 1987 年的苏联文坛。在这股发表遗著、旧作的热潮中间问世的,既有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如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古米廖夫的诗歌,也有作于 50~70 年代,以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肃反、卫国战争及斯大林逝世前后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为表现内容的作品,其中较为轰动的除别克的《新的任命》外,还有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普里斯塔夫金的《金色的云朵在这里留宿……》、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等。这几部作品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也都代表了它们成书年代的文学发展水平,因而具有无可否认的艺术价值。只是由于没有遇到适宜的外部条件,它们的问世都颇经历了一番曲折。这些作品因创作的时代不同而表现的内容各异:有的以讽刺加幻想的形式描写 20 年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冒进;有的借古喻今预言核战争的危险;有的把斯大林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直接写进作品,作为主人公之一加以艺术的素描;有的则触及自然科学领域或民族事务中的尖锐问题。进入 1988 年,发表遗著的趋势有增无减。帕斯捷尔纳克驰名世界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结束了 30 年的“流亡”,回到它的诞生地;格罗斯曼那部以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为时代背景反思的鸿篇巨制《生活与命运》在《十月》杂志上连载;扎米亚京

作于 20 年代初、幻想讽刺性长篇《我们》也终于问世。综观这样一些作品的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所以直到那时才得以发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涉嫌“诽谤”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制度;二是它们所“暴露”的多是苏联历史上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历史学家尚未得出切实的结论。在捕捉历史上的这些“空白点”时,作家们的目光大凡是敏锐的;但是在表现宏大的历史事件时,他们又无不囿于一定的个人生活视野。当时为了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领导人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历史上一些需要填补的“空白”,也就是说,如果不对这些“空白”进行适当的填补,就无法使人们相信公开性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在当时发表的作品应运问世了。舆论界对此作了大量宣传,不少作品尚未刊出,图书馆里登记借书的人们已经排起了长蛇阵;作品发表后,也的确在读者中和评论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在发表遗著、旧作的同时,一些作家仍在继续推出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如阿斯塔非耶夫的《忧郁的侦探》(1986)、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1986)、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边》(1986)以及拉斯普京的《火灾》(1985)等。这批作品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苏联文学发展进程的延续,无论就其反映现实的魄力还是艺术表现手法而言,都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但与难以计数的遗著相比,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几乎成了 1987~1988 两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支流”。1987 年,苏联文学界没有拿出一部描写现实的力作,相形之下,倒是政论在反映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方面扮演了主角。政论作为一种并非“纯文学”的灵活体裁,便于对现实作出迅速的反应,对生活中的矛盾进行直接而深入的剖析;同时政论作家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反映生活的笔触伸向了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领域,不仅对变幻着的现实作大胆的面面观,而且直接阐述自己的鲜明立场。1988 年,著名政论作家布尔金、施米廖夫、卡里亚金、契尔尼因科等人的政论集《苏联的改革》一书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到政论作家的行列中,以政论的形式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例如诗人叶甫图申科在 1987 年就写过不少政论文章。还有一些杂志在 1986~1987 两年开辟了专门登载回忆录的专栏,其中发表的许多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已故作家的文字或作家本人的日记、随笔等,都是鲜与读者见面。这样,由遗著、当代作家的旧作、反映

现实的新作品、形式各异的政论文和内容丰富的回忆录组成的 1986—1987年的苏联文学,呈现出了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就文学界自身而言,它的真正松动只是在 1986—1987两年中的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固然给文学界带来了如上诸般变化,但文学界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作家队伍中开始出现了宗派情绪和不容异见的现象。一些人利用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在无谓的琐事上发生激烈争吵;一些杂志的编辑部因文学见解上的分歧而互相指责对方为“宗派主义”。可见,在长期停滞之后猛然转向的苏联文学界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那么,对在短时间内大量刊出的那些填补历史“空白”的文学作品各阶层的广大读者是否都具备接受能力?作家、批评家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

## 一

从 1988年开始,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以“初步总结”为题,对前一阶段的文学作了一番回顾,发表了部分作家、读者的来信摘要和几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的谈话。其它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总结 1986—1987年的文学现状。涉及的论题主要集中在遗著的大量发表和政论、特写两个方面。以迅速反映生活见长的政论、特写,大多涉及包括生态平衡在内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其社会政治影响远大于文学艺术价值。大家虽然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推崇的政论作品也因人而异,但基本上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围绕着是否应该发表那么多陈年旧作以及该如何评价它们的问题,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作家圈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如老作家卡维林、诗人叶甫图申科等,对此表示非常的欢迎,不仅认为这些作品的发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充分肯定了它们的艺术价值,甚至认为其中某些作品足以标志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另有一些作家如普罗斯库林等,则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认为把这样大批的旧作刊登在杂志上,影响了反映现实的新作品的发表(甚至《新世界》的主编扎雷金也有这种看法),另一方面认为其中许多作品水平并不高,它们在读者中的一时成功只是由于描写了像斯大林这样的为大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而作品本身未必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出几年定会被遗忘。当然,他们并未绝对否定发表这些遗著,而是强调这样的作品应当出版单行本,杂志不应一哄而上,只让这样的作品充斥版面。从社会发展的总形势和这些作品产生的反响看,发表这些作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广大读者有了解

历史真相的强烈要求,这一点可从 1988年几家大型文学杂志如《新世界》《民族友谊》的发行量大幅度增加中略见一斑。此外,发表大量旧作品并未过多地妨碍反映现实的新作品问世。除莫斯科的两家文学刊物《我们的同时代人》和《莫斯科》拒不刊登旧作而集中发表新作品外,其它杂志上也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新作,活跃在当代苏联文坛上的作家们,1987年几乎都有篇幅或长或短的作品问世。当然大部头作品的创作需要较长的周期,一些作家的新作尚未完成;同时,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也在 1986—1987两年中表现出了新的特色。由此看来,1987年苏联文坛上没有出现质量较高的新作品,并不能归咎于遗作的大量刊行。再者,发表这样一些作品,不仅是为了恢复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它还可以刺激创作竞争,因为遗著中的确有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两相对照,倒是一些新写出的作品艺术性太差,既不能同苏联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相比,也无从与那些几经磨难始得面世的好作品竞争。

总的来说,自从苏联社会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文学界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1986—1987两年得以发表的那些旧作、遗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它们在文学史上该占据怎样的位置自有公论。从这个角度看,发表这些作品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必需。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不能否认在客观上为一些作家恢复名誉是必要的,但在肯定他们的创作时,不能否认,在客观上抹煞了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并因此而忽视了当时作家们的最新创作。然而,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巨变,的确确在大造舆论!

## 三

苏联 70年的历史由于政治运动迭起,不止一代作家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诸如禁止发表作品、公开点名批判、开除作协协会籍、驱逐出境直至遭到镇压。正因为如此,文学史上才留下了许多“空白点”——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家,一些没有结局的论争,一些至今秘而不宣的档案……在回顾并正视这一切时,不能不遇到如何公正地评价那些需要恢复名誉的作家们的创作,如何正确地处理侨民作家与苏联文学关系的问题,甚至一些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大作家也面临着后人的重新评价。一些作家的创作面目趋于完整,一些长期湮没的名字又成为人所共知,甚至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某些侨民作家的作品也出现在苏联的报刊杂志上。

这些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时、因地不同而有别,能否把它们统统纳入苏联文学的范畴?有些苏联学者认为,那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祖国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当然属于苏联文学,而侨民作家在海外的俄语创作则无法为含有一定政治因素的“苏联文学”概念所包容。同时,这一部分作品又应当是俄罗斯文学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否得到官方的承认,许多当代作家都曾受到侨民文学、特别是老一代侨民作家的影响。对文学史家来说,采用一个新概念来包容这样一个文学分支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于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个外延大于“苏联文学”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敢于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并向苏联读者适当地介绍侨民作家,同时酝酿把他们写入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这在1985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侨民文学分支进入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无疑是苏联文学界观念上的一大突破,它对于全面考察20世纪俄语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极大影响。

1986—1987两年间,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非常活跃。从报刊上反映出,批评的民主性有所增强,几家重要的文学报纸和文学评论刊物冲破了“一言堂”局面,人们敢于对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提出指责,对一部作品的不同意见可以在报刊上同时推出,读者来信也大量刊登在报纸的版面上。这样一种形势的出现是文艺界的新事物。它客观上对公开性原则的贯彻、对民主的进一步深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7年苏联报刊上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文艺理论工作者普遍对理论的现状表示了不满,认为应把对理论的阐述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同时强调了创作方法的多元化。因此,理论界一改对20年代风靡文坛的多种流派所持的冷漠态度,各种创作潮流的代表人物陆续得到了多方面的介绍。理论界不少人似乎不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统,而承认苏联文学的多姿多彩了。然而对于新的现实,文学创作尚且未及作出深刻的反应,理论上恐怕一时更难于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所引起的自上而下的文艺政策的变化、文化界松动局面的出现、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曾使许多苏联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那一次“解冻”。仅就文艺界而言,其现状虽然与50年代中期有许多相似处,但毕竟存在很大的不同。50年代中期,个人迷信的束缚刚刚冲破,苏联人民获得了思想上的巨大解放,尽管解冻随着与之俱来的混乱,那个时代造就了一大批有很有才气的作家,50

年代的思想解放在他们尔后几十年的创作中,也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1985年~1987年苏联文艺界的改革形势有别于30年前,有目共睹的是,当时苏联文坛猝然出现了许多作品,但如上所述,其中大部分并不是新作,不是对新时期的表现;它们借形势问世,其艺术魅力、审美价值尚待检验。1986—1987年两年大量涌现的作品并没有为文坛输送新生力量。同时,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来势凶猛,社会改革声势浩大,对文学界也多有触动,但许多棘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作家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还很严重;文学批评家不时因观点相佐而受到对方的报复、围攻;文学专著的撰写权不平衡。从总体上看,已经发表的,绝大多数为俄罗斯族作家的作品,少数民族文学的“遗产”还是刚刚开始挖掘;文学对生活的表现领域日益广泛,发表遗著的趋势虽未见得长久,但在短时期内还是会持续的。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当然因公众对文学所暴露的事实真相的适应水平而异,但是它们得以发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不仅表明了作家及文学刊物的立场,而且已经透露出社会对新的艺术思维和新的艺术观念的精神准备。

虽然当时苏联的历史已有70年,但由于农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问题的充分公开化开始还不久,历史学家尚无法在占有确凿档案的基础上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的估价。因此,人们自然地把探求真实的目光投向了以表现这段史实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希图从这里找到问题的答案。对斯大林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是当时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社会各阶层都对此作出了反应。1988年,《旗》杂志刊登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晚年写作的长篇随笔《从我这代人的视角看——关于约·维·斯大林的思考》,读者也异乎寻常地热衷描写斯大林的作品。从1988年3~4月间《苏维埃俄罗斯》报和《真理报》之间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的争论及其造成的影响中,也可见苏联公众对此问题的关心。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文学发生急遽变化的现实,在90年代初期发生的震动全球的苏联解体的社会巨变中显然是起到了一个舆论导向的作用,演奏了一曲“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前奏曲,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 参考文献:

- [1]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